

往事如风

我的爸爸妈妈都是数学老师,小时候曾听他们讲过他们的老师邵品宗的故事,说邵先生推着一辆婴儿车,上面有两个气球,写着“邵府”二字,在上世纪60年代的曲阜师院里显得卓尔不群。邵先生是华罗庚的弟子,在数论领域有建树,曾在“曲师”教书,我父母读书时正好赶上。因为这些故事,在我还没上初中时,就已经知道“数论”这个词儿。妈妈曾说,初学数论时觉得非常之难,换作邵先生教时,则觉得没那么难,这让我对数论二字心生向往。许多年后,在报纸上读到邵先生调到了青岛大学,顿时觉得我离“数论”二字又近了一些。

童年时恰适“科学的春天”,每个人都知道华罗庚和陈景润,华罗庚有时边走边思考,会撞到电线杆上,还对电线杆说对不起。而我作为数学老师的孩子,还多知道几个人的名字,比如杨乐、张广厚,他们是我少年时的偶像。杨乐去世时,我曾读到《中国青年报》的记者李大同写的文章,里面回忆了他采访杨先生的细节。他说杨先生审一篇论文会得到300块钱的报酬,在上世纪80年代,这算是巨款。李大同说“那您靠审论文就能活得不错了”,杨乐告诉他其实一年也就能审两篇,因为太耗费脑力。李大同问他写的论文有几个人能看懂呢?杨乐掰着手指头数,说有丹麦的谁,美国的谁,最后数出来,一共七个人。

一篇论文只有七个人能看懂,这七个人估计也得每人花上半年的时间,足够说明数学之难。的确,如果你问一个普通的中学生,他八成也会告诉你,数学是所有课程中最难的。我们读中学时,数学并没有今天的这么难。我上初中时遇到一位数学老师,据说,他木匠活得相当不错,身上常有锯末,棉袍口上偶尔还有刨花。他口才好,每次上课都像说相声,上课的特点是越难的部分讲得越简略。“学数学要靠悟性,不是靠看书,也不是靠听课”,他的这番理论很难推翻,但遇到困难怎么办呢?有一次我问他一个根式化简的问题,他看了看

题,又看了看我,说“你把这些平方都开出来,求个近似值就行”。我觉得他可太逗了,这是根式化简,他让我求近似值,我说:“老师这个好像不太对劲呀!”他瞪圆了双眼指着窗外说:“你家就在那儿,你回去问你爸就行了。”我回去问我爸,我爸说:“你确实不能问他,他是‘工农兵学员’,现在学历都不承认了,咱不能难为人家。”

从此,我就只听他说相声,不听他讲数学了。这样的恶果不久显示出来。我读高中时学三角函数,这都是纯纯的计算,大家都说简单,我却真的应付不来。考卷发下来,第一道题就卡住了,满张卷子没几道题做下来。大考都是集体阅卷,我爸是数学教研组组长,几位阅卷老师看到我的试卷,纷纷安慰他说,“他两个姐姐本事都挺大,上了大学肯定也不能回到咱们这小县城了,有个儿子留身边,不也挺好嘛。”我那次考试得了37分,一直到高考前夕“和差化积”的公式也没记住。

我曾经反思过,因为在代数、几何、三角三门课中,三角最简单,人人学得会,而我却怎么也搞不定。想来想去,问题可能早就埋下了。

话说大概是小学四年级时,过“六一”儿童节,每个学校都要组织文艺汇演,汇演前身着节日盛装的少年儿童们会手持花束、花环巡游。各校为争风头,纷纷想奇招,大队辅导员不知从哪儿搞来一辆卡车,上面扎了星星火炬,然后挑选几位同学星拱斗位。我有幸被选中去当了“活雕塑”,提前排练好多次,其实也简单,就是站在那儿,听辅导员一吹哨,立马二目炯炯做胸怀世界样。每个人手里的道具不同,有拿乐器的,也有拿篮球的,我怀疑其创意是受四大金刚启发。我手里拿的是一本硬壳的《三角学词典》。“六一”那天,我们都涂了红脸蛋,像哪吒那样神采奕奕,穿上白衬衣,蓝裤子,站在车里,鞋也是刚洗的,还抹了白粉,一跺脚就冒白烟。我没有看过这个鬼斧神工

的画面,也没有照片留下来,因为“只在此山中,云深不知处”。我一度怀疑这个仪式有哪个地方搞得不对,冲撞了啥,以至于后来怎么也不会三角函数。当然这不是科学,只能算疑神疑鬼,应该自我批判。

我后来学其他数学都学得不错,没耽误考大学,只是阴差阳错地改了学文科。

1992年,我考入浙大,参加的是理工农医类的考试,那时的浙大与今天不同,基本是个工科院校,文理科招生都很少,一个系只有一个专业,一个专业的一个年级只有一个班,一个班也只有20个人。中文系的同学几乎全是通过理科考进来的,而且上了大学还学高等数学。我们学的高数是最简单的一类,专为文科专业开设,按理说,对我们这些曾经的理科生来说,这个难度都不算事。可是我那时便发现,再简单它也是数学,既是数学,就得费另一番脑筋,同学们读了文学就不愿再费那个脑筋,所以,一起上课的中文系、外语系的同学不时会有人高数挂科,而挂科的同学极有可能高考时数学也得了满分。

教我们高数的老师非等闲之辈,她的名字我还记得叫金忆丹,除了教我们这些数学废柴,另外教的是“混合班”。“混合班”是高考成绩最好的同学编的班,不限专业,专挑难的学,他们的校服与我们不同,教材往往也不是统编的,教混合班的老师当然是教学水平最高的。据说,为了让金老师休息一下,教务处特地在混合班的课之外调给她最简单的一类数学课。可我听金老师曾抱怨,其实教混合班的数学远比教我们容易,因为那些同学基本也不用教呀。

我刚在百度里搜索,发现金忆丹老师编著过不少高教教材,其中有一门叫“复变函数与拉普拉斯变换”。当时理工科的同学都学这门课,与我同宿舍的有四位地球科学系的同学,学完高数、线性代数和概率论后,也学了这门课。之所以印象如此深刻,是因为某天我在宿

舍里睡觉,听到门响,以为他们下课回来了,可是房间里没有人说话,连对面寝室也没有声音,等我起身时,发现奇幻一幕:四位同学有的站有的坐,全都两眼无光,呆若木鸡。我问这是咋了,有位同学说,都让这个“拉不拉屎”给搞晕了。我下床看他们的课本,上面赫然印着“复变函数与拉普拉斯变换”的标题。这有多难,比《追忆似水年华》难,就像《尤利西斯》一样难?此时已是大三,我是一点数学也学不了,否则怎么也得搞明白这到底是啥东西。

看过一本叫《费马大定理》的书,里面写到一个德国人,失恋了准备自杀。他是个严谨的人,自杀的时间也很精确,在这个吉时(或者应该凶时)未到时,他看了一会儿数学书,不想被费马大定理吸引,将自杀的事抛之脑后。这似乎说明数学这种思维的能量高于爱情和生命,有一种说法是,就算宇宙毁灭了,数学依然存在。可是究竟数学只是人类发明出来的思维工具,还是宇宙运转的法则,也各有说法。

我有段时间喜欢边跑步边听书,听了一本书,叫《世界的逻辑》,是南方科技大学的教授马光远的新著。他一开头便讲了1930年数学家希尔伯特的著名演讲,即著名的“我们终将知道,我们必然知道”,代表了一个自然科学家对世界的信心。马先生说,演讲的前一天,24岁的哥德尔向《数学月刊》投了一篇文章,叫《论数学原理及相关系统中的形式上不可判定命题》。这个长长标题的论文,在于说明一个道理,任何数学系统中都存在永远无法证明的命题。

这本书的内容相当有趣,我来回听了两遍,还没听够,因为他说的道理我实在是喜欢——理性世界的尽头就是数学,而数学亦有边界。这就意味着,理性的认知存在着边界。有一天,在读大学的大女儿做完试验后,跟我聊天,她说突然觉得,“人”是一个最不科学的东西,现在却在天天研究科学。她的这句话把我说“宕机”了,确实,这是个难题,比数学还要难。

风物小雅

茶香袅袅(组章)

崔均鸣

题记: 人在草木中,茶也。红、绿、青、黄、黑、白,包罗世间万般颜色和滋味。	
一、祁门红茶	你说,南方有嘉木。 我说,北方有相思。 我们的孩子说,嘉木风可摧,相思不可断。
黄山支脉,蓬勃的生命在海拔六百米的山地上疯狂生长。 一个关于北纬30度的传奇密码,逃出祁门,赫然亮相于百年前的巴拿马。从此以后,一些云雾缭绕的传说,漂泊着,流淌着。一如山间的汨汨清泉,终于走向了蔚蓝的海洋。 一抹东方故国的神秘色彩,以温润的形态慢慢浸润开来。 一杯红茶,足以概括太平洋的汹涌波涛。	
这很像是中国功夫—— 静如处子,动似脱兔。动静之间,大象无形。把躁动的心情安顿妥当。 让纷乱的日子归于平静。 品味着生活的苦,也尝遍了生活的甜,那些五味杂陈的往事被岁月浸泡得久了,便会升腾起袅袅的茶香。	
二、西湖龙井	

清明时节,从西子湖畔上飘然走过。
无论你是柳浪闻莺,还是花港观鱼。洒脱地撑起一把油纸雨伞是一名游客的传统标配。
阴天挡雨,晴日遮阳。
阴晴不定的时光里,举作一面猎猎招展的旗。
白娘子 and 许仙的传说,塑造的一个民族的生活习惯,也刻画了一片土地的绰约风情。

当然,你还需啜饮一杯龙井茶。
欣赏着一枚枚鲜嫩的叶片在纯净的水中起起伏伏,恰似湖水中那一条条童年的小鱼,冥想的涟漪便层层叠叠地泛了起来——
游游荡荡,无所事事。惺忪的眸子里,装满了大自然的希望和生机。
老子的哲学悄然附体:复归于婴儿,复归于无极,复归于朴。

三、凤凰单丛

凤凰于飞,翺翺其羽,亦集爱止。
亲爱的夫人,此时此刻我想起了你——
那些山谷里的回响,见证了 一个时代,也见证了 我们懵懂的青春和可笑的“乌龙”。当岁月的种子紧紧依偎在冻土里的时候,许多绮丽的梦想就已经开始萌动了。
浓郁的花香,蜜一样甜。
纯粹的恋情,水一般净。
我们牵手屹立于世间的姿势,构成了南国里旁若无人的风景。

如今,每当夜幕降临,我们一家便围炉而坐。
一壶,二杯,三人成影。
没有童年时的笑语喳喳,没有青年时的誓言铮铮,也没有中年时的脉脉温情。只有一只沸腾的水壶,还在嘟囔着夏日里无边的寂寞和宁静。



■油画《如妆》
孙小娥

食光印记

阳春面

晓 瑛

我曾经在上海生活过四年,所以上海于我而言是很亲切的,甚至口味里也有了上海的痕迹。但记忆中令人垂涎的味道并没有什么珍馐佳肴,而是那些简单到上不了台面的东西,最近又尝到了阳春面,感触良多。

南方人爱吃米饭,北方人爱吃面食,但是也不尽然,阳春面就是个例子,味道最纯正的就在上海和周边的一些地方,是上海风味特色小吃。我在上海读书的时候,学校的食堂和外面的面馆里都有阳春面,那是当时上海最普通的一种家常面条。单看阳春面的名称,就有那么一点文化味,以至于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竟不知所云。这也没什么奇怪的,因为先前知道的面条绝大部分都是以做法命名的,像手擀面、拉面、刀削面、抻面等等,如果加了卤子,也是用卤子的内容命名,比如海鲜打卤面,雪菜肉丝面之类的,似乎只有这阳春面是唯一的例外。在上海读大学的时候日子还是很清苦的,能在饥肠辘辘的时候吃上一碗阳春面是一件最舒服不过的事情了。

学校里的阳春面和外面小摊子上的差不多,用的是细盐、味精和熟猪油,用开水冲开就算是美味的汤了,白白细细的面条常常是盛在粗瓷的大碗里,上面一定有随意撒上的细碎葱花,而且一定是那种江南的香葱,不知道这是不是代表了阳春的色彩,那诱惑力绝对是难以抵御的。偶尔也吃到过盛在用猪骨熬制而成的高汤里的面条,更是忘不了的清



岛上逸事

蟠龙庵记

张 京

从泊里镇驻地往西行四公里,有一村叫蟠龙庵。因村旁曾有一尼姑庵,名曰蟠龙庵,村子因此而得名。

我去蟠龙庵村是在一个早晨,此时已是深秋,天高云淡,雁行有序。风从村北吹来,掠过一片片刚刚染绿的麦田,挟带着新翻土地的气味。村口有一株老银杏,已经有四百余年的寿数了,现在还是枝叶繁茂,遮天蔽日。树下经常坐着几位老人,晒着太阳,吸着旱烟,烟雾缭绕中,眼睛里流露着很多的故事。

这里就是蟠龙庵的遗址。
“这树还见过大明的人呢。”老人吹出一口烟,话从烟雾中飘出来,又钻进我的耳朵。

我仰起头仔细看这银杏树,只见叶片金黄,在秋阳下闪烁着光辉。一阵风过,叶片簌簌而下,如金片从天而降。我想,这叶片落了又生,生了又落,是否还记着几百年前栽树人的模样呢?

如今,庵早已不见,只有村子远近闻名。据村中老人口述,尼姑庵初建时很小,只有三间草屋,两个尼姑在此修行。后来香火逐渐旺盛,又买地重扩。明末清初,竟成了一方名刹。最盛时,有尼姑数十人,晨钟暮鼓,香客不绝。

盛极必衰是自然的发展规律,蟠龙庵也逃不出这个定数。清嘉庆年间,寺僧与附近村民因土地争斗,官司打到了县衙。县太爷判寺院缩小规模,不得扩张,并把多出来的土地还给村民。蟠龙庵自此日渐式微。民国初期,已是僧去庵空,只剩几间破屋。现在只能从老人们的口中拼凑出当年殿堂的模样了。

蟠龙庵不只是庙宇的存在,还是戏曲茂腔的发祥地之一。茂腔戏在当地人的文化底蕴里,堪比陕西的秦腔,胜过河南的豫剧,已经完全渗入人们的骨血里。

据民间口传,明洪武二年,王姓叔侄二人从江苏海州迁来,他俩在海州是唱戏的,人们俗称“海冒子调”。来此居住后,为了讨生活沿街卖唱,但本地人并不喜欢听。有一天,他俩卖唱返回途中,遇一妇女跪在坟前大哭,叔侄二人听后,感觉这妇人的哭腔竟带着点海冒子调,但比海冒子调的唱腔顺耳。叔侄二人回家后,不断揣摩,把那妇女的哭腔融入自己的唱腔中,后来的卖唱才得到了人们的认可,尤其是老人、妇女,更是喜爱。

经典茂腔《罗衫记》,不但唱腔动听,故事也与蟠龙庵有关。

明永乐年间,举人苏云携其妻郑月素一起赴任,在五霸江口登上一艘木船,谁知船主徐能贪恋郑月素的美色,设计将苏云沉江,又把郑月素抢回家中成亲。此时郑月素已有身孕,誓死不从。徐能的女佣姚婆见她可怜,偷偷帮郑月素逃走。逃跑途中,郑月素生下一男婴,见追兵赶到,便撕下罗衫并写血书一封,放至男婴身上,然后佯装投井而死。追兵走后,她躲进了蟠龙庵,削发为尼。

后来,在泊里教书的高密书生听闻此事,便写成了戏词,被戏班子传唱至今。

时下,在原蟠龙庵遗址上,村里出资又修建了一座戏台,每逢闲时,便有剧团登台演出。那唱老生的,已是古稀之年,嗓子沙哑,却别有韵味。唱到悲切处,台下会有老人拭泪。我想,他们哭的不仅是戏中人的命运,恐怕也是哭自己的一生吧。

村里也有会唱《罗衫记》的老人,恰好在银杏树下相遇,我问他为何喜欢唱,他笑道,“不唱难受,唱了舒服。”这话简单,却道出了艺术的真谛:艺术本就不是为了取悦他人,而是安顿自己。

我来到银杏树后边的竹林里,仿佛看见僧尼在林间行走,诵经声随风飘散。想起贾平凹先生写商州的那句话:“地上的山水,人的肚腹,都有着不尽的玄机。”这蟠龙庵虽已不存,却以另一种形式活在茂腔戏文中,活在村民的记忆里。

我想,这世间万物,有形状的皆会损坏,但精神永远不灭。蟠龙庵虽然不存在了,但它化作了一个地名,一段戏文,一种声音,继续在这方水土上生长、流传。

人生如戏,戏如人生。在青岛西部的这个村庄里,数百年来,人们用茂腔演绎着悲欢离合,用勤劳演绎着蟠龙庵村的前世今生。

天地悠悠,过客匆匆,唯有这声音,这情感,代代相传,不绝如缕。

庵已不存,庵亦永存。